

戒网专家陶宏开指出—— 网瘾不是精神病



陶宏开接受大众网记者采访。

“把网络成瘾者当精神病来治,是为了获取通过救治而得到的利益。”5月30日上午,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戒除网瘾专家陶宏开教授接受大众网采访时指出,网瘾是孩子的认识问题和行为习惯问题,而不是精神病。

陶宏开教授认为,网络时代到来,普通人的生活、工作方式等依赖于网络的程度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其中不少人沉迷于网络游戏,这是存在区别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普通人依赖网络,是在查询信息、自我提升、交流信息,还是在荒废正常生活对网络游戏“潜心研究”,这是依赖网络和网络成瘾最大的区别。

陶宏开说,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青少年的家长要与时俱进,对网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指导青少年健康上网!

在谈到不久前,某些单位和专家建立《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不了了之一事,陶宏开教授认为,“他们是把它(网瘾当做精神病)当做盈利模式进行炒作”。陶宏开认为,孩子即使网络成瘾,也没有犯罪、犯法,把孩子强制关闭进行戒网、电击、电疗这反而是违法的。网络成瘾不是精神病,任何人没有权力把他们关起来进行戒网。

“把网瘾当做精神病我是反对的。”陶宏开表示,“我认为,网络成瘾主要是认知问题和习惯问题,而精神病是对自己的认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有网瘾的人上网有自己明确的目的,就是去放松、去寻找快乐,为了成功,为了放松。把网瘾患者当做精神病来治,实际上是为了获取通过救治而得到的利益。”

陶宏开表示,对有网瘾的孩子实施强制关闭、电疗、电击那是对孩子的摧残。要根治网瘾,最主要的是找到网瘾形成的根源。“应该是家庭教育不当,其次是社会文化不良影响。孩子平常面对的各种压力导致自己投身网吧和网络,尤其网络游戏。我们需要的是有针对性对孩子进行引导。”

(来源:大众网)

网上群体性事件“一呼百万应”

专家建议 应提高干部对“两个舆论场”的敏感度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沪苏渝皖等多个省市采访时发现,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而其中的一些负面“网上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党政机关形象。对此,许多地方党政干部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认识,对网民回应不足、不及时、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提高干部对“两个舆论场”的敏感度,认真回应多形式的群众诉求。

网上“一呼百万应”现象

“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安徽省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主任车敦安说,如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仅新浪网一条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

“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在百万人次以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家平说。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上群体性事件才告一段落。

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

同样,另一情形“网上群体性事件”也同样是“一呼百万应”,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网民对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铺天盖地;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等事件中,在

近来,“媒体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虽有吸引眼球之处,于司法视角看,仍属个案。但就是这些个案,在网络舆论冲击下,一一发展成为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

在这样的民意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声音充斥着质疑、批评、指责。案件处在侦查(或补充侦查)环节,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但“媒体审判”的裁决书似乎已经下达。一些媒体报道与网民评论互相呼应,并随意使用定性词汇,以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言语描述案件或当事人,从而给审理案件的法官、陪审员施加了某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压力,使本不应成为舆论常态的成为常态。比如认为,梁丽无罪,胡斌应重判,邓玉娇系

网上均引起了“百万级的点击”。

调查发现,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网上群体性事件”有新趋势

有关专家对近几年发生的十多起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后发现,这些事件有三种类型,并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

一是“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网上群体性事件”。如重庆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随后形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即现实社会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与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群体性讨论。这两个事件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对抗性。

二是“现实诱发型网上群体性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直接诱因是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在会上,发言反对房地产商降价以及抽名贵烟。他的言行引发了网上持续热议,主要矛头集中到官员的职务消费上。现实社会并没有发生群体性对抗,而网民在网上则形成了强大的“表达对抗”。

三是“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群体性事件”。如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一位留学生高举藏独旗幟遭到网民强烈谴责,引起了网上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然后逐步升级到“人肉搜索”,当得知这位学生父母在青岛的

住处后,一些网民聚集到那里抗议,在各方劝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步平息。

不少基层干部还不适应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期某些网群事件频发,暴露了基层党委政府对处置这类网群事件的手段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缺乏清醒认识。

受访的基层干部将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更关键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反映,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群体性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进而导致心向往之的政治影响缺乏正确认识。

这就导致一些负面消息甚至不实消息扩散,引发网民意沸腾时,地方党委、政府仅仅依靠公安网络警察、地方宣传部门去应对处理,孤军奋战。

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负责“公共行政与媒体关系”课程教学的王石泉博士认为,过去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媒体存在着“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问题,现在互联网传播时代,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对当前网络传播的规律理解程度不深,还习惯于“宣传部把关”,结果导致“小问题引

发大热点”,最终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

互联网专家指出,在涉及公共权力的互联网舆论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传播载体;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

专家认为,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认可。如何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护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

王石泉等专家指出,互联网时代下,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传播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还有许多基层干部对此认识不清。培训干部在互联网时代中如何主动设置议题,提高政府传播效果,在当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来源:人民网)

首先,坚持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改“一面提示”为“两面提示”。要给冲突、对立的双方以表达自己看法的平等机会。

其次,坚守报道的客观性原则,避免添加报道者的主观色彩,改“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任何主观感情因素的添加都有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媒介在作类似报道时,应忠实于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坚持用中性语言来达到传播目的。

再次,司法新闻报道应在传播、普及法律知识,消除社会“知沟”等方面充分发挥功能,承担起社会职责。只有全社会都能充分了解法律知识,舆论才能正确监督司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媒体审判”现象。(来源:人民网)



“云南躲猫猫事件”网上点击率超百万。



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右二)被指抽天价香烟。



“林嘉祥事件”网上点击率达180万。



陕西汉中市委书记杨光远被指戴52万元劳力士。

J 焦点网谈

男子要求3岁孩子让座 被拒后拦公交车抗议

新闻:30日上午,在南京市一辆141路公交车上,一个妇女带着一名三岁的孩子各占着一个座位,一名男子强硬地要求孩子让出座位,在这一要求被孩子母亲拒绝后,男子竟然下去拦住公交车讨说法。(5月31日《现代快报》)

孩子抱着可以节省个座位给别人,这是美德,也是应该做的。这个妈妈没有教养,极端自私,不会教育出好孩子!

——南京网友

对不自觉的人就得像那位男士一样较真!

——北方网友

虽然做法有过激,但还是可以理解的,鄙视那个带孩子的女人!

——新华网友

真不是个男人,和三岁小孩争座位。小孩不买票坐一个位置,完全合法、合情、合理。

——南海网友

各地公共建筑 频现风水元素

新闻:近年来,公共建筑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了风水因素,各地的“风水楼”不断涌现。不断出现在“风水宝地”上的公共建筑,绝大多数来自市政官员的“构思”。因为在公共建筑兴建过程、尤其在政府建筑工程中,无所不在的“长官意志”几乎决定了任何一个细节。(5月31日中国新闻网)

那些讲风水的帝王将相到头来如何?还不是被人从坟里扒出来展览。

——人民网友

有些官员干的坏事太多,只有求天保佑了……

——新浪网友

信仰的缺失,制度的苍白,体制的落后造成的。

——网易网友

没有坚定的信念,又无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只好求诸风水了。却不知人性的良知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

——南海网友

T 头条评论

□ 常梦飞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中国卫生部门呼吁世界最大规模的控烟宣传——在全国每年约1千亿盒卷烟的包装上,印上折寿、自残、致畸、畸形胎儿等健康警示图形。(6月1日《新京报》)

坦率地说,卫生部门的呼吁让人油然而生一种苦涩的感觉。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其中第11条规定:“烟草制品包装上,

必须说明烟草使用有害的健康警句,健康警句应该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占主要可见部分的50%以上;警句应有多个版本,并轮流使用。”自那时起,四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条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落实,“我国市售香烟包装上的健康警示,仍然小而不清,模糊而不明确”。一方小小的烟盒,一直让烟草商肆意盘踞,政府和社会联手组成的控烟方久攻不下,直到今天还要“呼吁”,这实在是一种让政府蒙羞,公众挫败的社会现象。

烟盒上的警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有人就不以为然,认为对真正的“瘾君子”来说,烟就是命,他不会在意烟盒上印什么警示。既然如此,那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却执意要拿下,而烟草商却百般周旋,寸步不让?

城管网站被黑网民叫好值得深思

□ 欧木华

这两天不少常州市民在打开常州市城市管理局网站时,惊讶地发现整个网站被恶搞得面目全非,网页上满是侮辱城管的言语和照片,想查找的信息都没有了。据了解,网站被黑后内容基本上没有被恶意删除,只是增加了一些恶作剧的内容。目前,常州警方已介入调查。(6月1日《扬子晚报》)

黑客攻击城管网站,应该受到谴责。但让人颇感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网民对于城管网站的被黑,并不感到愤怒,部分网民甚至不吝于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受害者受到指责,而黑客却成了英雄,如此“黑白颠倒”的民意表达,到底说明了某些网民的道德观出了问题,还是城管确实不得人心?我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

网络民意的特点向来是“正义与鼓噪同在,良知与泄愤共存”,出现一些城管部门看起来是“黑白颠倒”的留言,也不足为奇。而城管部门的社会形象,长期以来广受百姓非议。黑客黑了城管网站,在常州市城管鼻子上涂了点白粉,

□ 吴双建

5月31日晚,关于邓玉娇案传来两条消息,一则是恩施州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警方以防卫过当定性移交检察机关;二是当地对黄德智、邓中佳分别作出了党纪或政纪的重处,查封了涉嫌非法经营的“梦幻娱乐城”。

有一则消息,可能还与此相关。据荆楚网31日报道,当晚湖北省公安厅正式启动为期三个月的娱乐场所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这个问题,即便对不少坚决支持在烟盒上印上警示图形的民众来说,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

原因其实一点就破:首先,吸烟作为一种嗜好,无论是对吸烟者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弊大于利的,这一点,有无数个个案和大量的权威统计数字做依据,毋庸赘言。但由于税收、就业、传统、禁烟成本及烟农生计等原因的考虑,各国政府还无法采取法律或行政的手段彻底禁止烟草的种植、生产和销售,更谈不上禁止个人吸烟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宣传的手段,使烟民认识到吸烟的危害,进而自觉地弃绝烟草,也就是一种虽然是退而求其次,但却是最主要的禁烟手段了。在烟盒上印醒目的警示图形,虽然不如政府直接下令禁烟那么痛

让他们以小丑形象示众,手段固然不道德,但其反映的内容,未必都是无中生有的中伤。

天门城管打死人的新闻,笔者记忆犹新,城管将商贩打成植物人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至于城管将菜农打得溃不成军,在某些地方,更是百姓经常能看到的城管执法常态。因此,笔者更愿意相信,所谓的黑客恶作剧闹内,其实并非仅针对常州城管,而是针对全国城管的集体形象。

笔者无意于为黑客的不道德行为辩护,但笔者以为,哪怕是罪犯也有批评的权利,同理,黑客也有批评的权利——当然,前提是批评的渠道是合法的,而不是通过入侵服务器的渠道。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批评方式,即便批评内容切合实际,也是不应该提倡并为之叫好的。明确这点之后,城管部门不妨想想,百姓批评意见能直达城管部门管理者的渠道,我们到底有没有?

我想,我们既要惩罚黑客,也要寻求一种城管与百姓良性互动、坦诚沟通的方式,城管部门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利用网站等各种资源,建立百姓自由批评城管的平台,而城管,应该从这个平台中接受客观的批评,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的平台,未必会让黑客的丑恶行为完全绝迹,但有了这样的平台,对于减少城管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冲突,显然是有利而无弊的。

我信,有了这两点,也成了邓玉娇案从今后,有了警方与民意的良好互动开端。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认定仍需需检方认可,结果还需法院判决。而另外一些公众关心的细节,也还需厘清。

邓玉娇案的命运,由此成为很多民众心中久久不能落下的石头,然而,巴东县一二次次的通报,加剧了民众对邓玉娇命运的怀疑,对司法的怀疑,由此引发当地政府的信任危机。从今天报道的细节中可以看到,认定邓玉娇案情的警方,已经从巴东方面变成了恩施州公安机关,再加上湖北省公安厅也积极介入,始得案情的基本事实得到保障,也保证了邓玉娇能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更高级别警方的介入,是舆论呼吁的结果,相关部门进行了积极回应,让人在悲

快,但由于它具有降低人们吸烟的意愿,最终使烟民队伍逐步萎缩的功效,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釜底抽薪之举。

其次,从烟草商的角度来看,虽然他们还可以合法地生产和销售烟草,但由于禁烟运动的长期努力,他们已经不能像推销其他商品那样,为烟草大肆做广告了,充其量利用法律的漏洞打一点擦边球,于是烟盒就成了他们最后的宣传阵地,绝不能轻言放弃。在烟草商们看来:在其他市场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烟盒就是烟草品牌的唯一传播载体。吸烟者多以品牌包装作为选择根据,而不是根据气味,包装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评价,最终影响销售。

在中国,还用一個很特殊的情况,那就是“非自购性香烟”或曰“礼品香烟”一直是

烟草销售的一块“大蛋糕”,因为它是高档烟盛行的温床,也是烟草利润最肥厚的部分。不久前被媒体曝光的周久耕局长,抽的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极品香烟就是一例。而如果说烟盒真的如卫生部门所呼吁的那样被“印上折寿、自残、致畸、畸形胎儿等健康警示图形”的话,在喜欢讨吉利的中国文化氛围里,那香烟成为礼品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无疑的,其销售和利润也会被大大降低。

围绕一方小小的烟盒,控烟方和烟草商已经博弈多年,到目前为止,烟草商一方仍然占着上风。但烟草商必争,社会也应该必争。中国卫生部门的这次呼吁,相当于吹响了新一轮攻防的进军号,所有主张控烟的人,都应该出来表达自己的支持。

威胁式举报获刑 是否处罚过重

□ 赵登岩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村民季大海给上级机关打电话称,如不处理村支书的“贪污受贿”行为,就炸毁附近的铁路大桥。苏家屯区法院日前以犯编造虚假信息罪,一审判决季大海有期徒刑一年。(5月31日《京华时报》)

何谓编造虚假信息罪?尽管季大海编谎言炸桥,一定程度上也符合编造虚假信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成立要件,但是后果算不算“严重”?同时他还附加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不处理村支书的‘贪污受贿’行为”。也就是说,不同于一般的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季大海的动机不在非法得利,而是为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和举报权。唯一的过错在于,这种监督举报采取了威胁方式。

因此恕我直言,把“有期徒刑一年”的罪责加在一名履行正当权利的举报者身上,显然有法律教条主义嫌疑,量刑无疑过重。

就本质而言,举报也是一种维权,维护自身或公共利益。然而现实来看,公民维权似乎越来越难,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沉重。不到走投无路忍无可忍,谁也不会跟生命或法律开玩笑。罚责采取威胁方式的举报维权者,固然能震慑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但长远来看,这会导致丑恶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的举报者更少,举报维权途径更不畅通,其结局只会使原本存在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